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化政策

汉斯·德·威特

汉斯·德·威特（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各国政府越来越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经济发展、贸易和声誉的重要因素。因学生及教职员流动加剧、各分校及国际院校日益增多，以及吸引国际人才的激烈竞争，高等教育机构及各国政府正积极调动力量，推动国际化进程。

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和计划是各国政府为发挥积极的决定性作用而做出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尝试，但它们的方法、理由和优先事项却有很大的不同。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政府的议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对国际化的更多关注。

2018 年开展的一项全球国家政策普查（Crăciun，2018）显示，只有 11%的国家制定了官方的国际化战略，大多数国家是在过去十年中采取的。这些战略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制定的——四分之三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制定的。欧洲国家率先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国际化战略思考，三个国家政策中的两个都来自这个世界地区。

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促进国际化的措施。事实上，为了支持国际化进程，许多国家既采取了直接措施（如重新评估其签证政策，给予国际学生和学者优惠待遇，通过谅解备忘录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跨国教育），也采取了间接措施（如支持政治话语国际化，给予大学国际化活动自主权）。

国家政策作为催化剂

国际化战略和计划大多仍是在制度层面上制定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机构的运作没有一个国家计划。在确有国家计划的情况下，机构的运作可能与计划相冲突或与计划相一致。国家政策可以作为国际化进程的催化剂或某种阻碍，但大多被视为促进国际化进程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它们将国际化与其他关键的国家优先事项（如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相结合。它们鼓励机构和个人通过国际化来协助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总之，国家国际化战略和计划不仅提供了国际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形成了关键行动。

但是，假定这些国家计划有共同的理由和办法，那是一种误解。高、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在政策和做法方面存在差异。此外，显性和隐性的政策与实践也有所不同，一些国家有详细记录的计划，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计划，但有明确的活动。

关键指标

总的来说，文献指出了以下几个关键指标，可以用来指导对国家国际化政策进行更系统的反思。

参与：政府能以直接（例如，通过明确的政策文件推进国际化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投入指定用途的资金）或间接（例如，以话语形式来支持国际化，允许大学用自己的经费

追求发展国际化）参与。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可能来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一个广泛的生态系统教育，包括各部门（如教育部或外交事务部）、其他国家机构、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区域机构和机构等。

历史：虽然政府对国际化的间接支持由来已久，但更直接和战略性的行动、政策和计划直到最近才出现。

地理焦点：总体而言，国际化的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欧洲的政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放眼全球，国家国际化战略在欧洲盛行，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盛行。

战术焦点：有些策略是相当通用的，而另一些策略则有特定的焦点或行动线，定义了活动或兴趣的范围（例如向内或向外的流动性）。

有效性：人们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性知之甚少。这可以解释为，大多数政策都是最近出台的，所以很少有研究评估政策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因此，证据通常是轶事或依赖于与跨境国际化（即国际学生流动性）相关的量化措施。

政策模拟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或与入境流动（例如在印度）有关，或与跨境流动（巴西）有关，或与双向流动有关。流动性是大多数政策和计划的中心，其次是研究和出版合作；网络和联盟；提高质量，力争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本土国际化”、“课程国际化”，以及国家和外语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缺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公正、包容和公平等问题。尽管这些政策的数量明显增加，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模仿”，这些国家似乎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西方国际化范式，高度关注流动性、声誉和品牌，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它们似乎通过奖学金计划的结构和条款、地理优先事项以及在教育和研究伙伴关系方面的选择，维持了高收入国家的主导地位。需要更加重视区域合作(南南网络和伙伴关系)，更加注重国内课程的国际化，以突破高收入国家的国际化模式，并根据地方、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文化和优势因素等制定政策和行动。